

# 從五臺山到徑山： 密藏道開與《嘉興藏》初期經場成立論考

王啟元

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法鼓佛學學報第 20 期 頁 129-157 (民國 106 年) · 新北市：法鼓文理學院

Dharma Drum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no. 20, pp. 129-157 (2017)

New Taipei City: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ISSN: 1996-8000

## 摘要

密藏道開主持開雕的方冊藏——亦即後世聞名之《嘉興藏》，在選擇刻經場所的初期，曾經遇到過不小的困難。後人熟知的方冊藏五臺山妙德庵經場，並不是在一開始唱緣時就定下來的。相反，那是道開禪師經過反覆溝通、妥協，綜合包括師長、護法檀越等各種人物意見之後，才得來的結果。入藏流傳之《密藏開禪師遺稿》上下卷，保存了方冊藏主持者密藏道開，於五臺山刻經時所作的不少書信，對還原當時整個時代、背景、機緣，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學界至今對此未作太多深入研究。本文略引道開所作尺牘，證以同時代居士士大夫記載及相關傳世文獻，考察萬曆十四年至十六年間，方冊藏開雕之前及初期的錯綜關係，還原佛教史進程中的一小片真實現場，亦欲證明高僧大德荷擔大法之懿行，絕非泛泛之談。

# 目次

---

- 一、楔子
  - 二、卜吉四山
  - 三、無邊捨宅
  - 四、雙徑之圖
  - 五、尾聲
- 

## 關鍵詞

密藏道開、嘉興藏、五臺山、經場、傅光宅、馮夢禎

## 一、楔子

通行本《水滸傳》中有這麼一個橋段：晁蓋討曾頭市中箭身亡，有位北京來的僧人在水泊梁山做水陸法事，吃齋閒語時帶出了一位日後的好漢領袖——盧俊義。據小說第五十九回〈公孫勝芒碭山降魔，天王曾頭市中箭〉回末載：

一日請到一僧，法名大圓，乃是北京大名府在城龍華寺僧人。只為游方來到濟寧，經過梁山泊，就請在寨內做道場。因吃齋閒話間，宋江問起北京風土人物，那大圓和尚說道：「頭領如何不聞河北玉麒麟之名？」<sup>1</sup>

明代小說中的「北京大名府」，自然就是大明北京城。儘管這位僧人唯一的作用是引出全書的那位二頭領，但無論是他的名字「大圓」，還是駐錫的「龍華寺」，不僅未必是杜撰，且大有來頭。明代小說家創作中闖入當代人名、地名的做法非常普遍，晚明北京城即正好確有位高僧名字叫作「大圓」，曾駐錫名藍潭柘寺。<sup>2</sup> 而小說裡所駐錫的「龍華寺」，更是赫赫有名，可以視作晚明佛教復興運動中的一大「現場」。通行本水滸的作者，或許是為襯托水滸二頭領的出場，才選擇了一位行業外同等地位的人物來匹配才顯得頭領尊貴。《水滸傳》這樣的名著中一句不經意

---

\* 收稿日期：2017/01/24，通過審核日期：2017/04/07。

本文為復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15）的階段成果。

<sup>1</sup> 施耐庵，《水滸傳》，第五十九回〈公孫勝芒碭山降魔，天王曾頭市中箭〉。

<sup>2</sup> 瞿汝稷，〈送大圓上人住持潭柘寺〉，《瞿罔卿集》卷6，頁179。另虞淳熙，《虞德園先生集》卷1，頁158，有〈送大圓禪師住持潭柘龍泉寺序〉，知其為萬曆時高僧。然通行本《水滸傳》此處記載為巧合還是闖入同時代人物，尚需更多材料，俟考。

的閑文，也能反映出晚明社會生活的實景。

水滸好漢按下不表，那座著名的北京龍華寺，今天依然立於什剎海北岸，據《帝京景物略》卷一「龍華寺」條載：

其（龍華寺）緣起奇，其所致天下古德又奇。萬曆之初中，遍融大師自蜀，達觀大師自吳，憨山大師自金陵，月川大師自五臺，雲棲大師自武林，錫先後止焉。寺之規，必擇方外賢者主方丈事。<sup>3</sup>

這座寺院在晚明最為出名的，便是多位著名高僧如遍融、紫柏、憨山、鎮澄、雲棲等晚明禪林尊宿，皆曾駐錫於此。另一件使龍華寺揚名的，就是紫柏真可與密藏道開於萬曆十四年（1586）春，在此倡議刊刻方冊大藏，亦即日後聞名法界的《嘉興藏》。當時，此盛舉得到了朝野眾多居士士大夫的空前響應，僧界如當時最高僧官、僧錄司左善世、慈壽寺住持本在和尚，也曾有過響應；更不用說唱緣的「地主」——龍華寺住持高僧瑞庵廣禎，亦是積極參與其間。瑞庵和尚的另一身份是當時內宮皇太后的方內交。說道那位晚明佛教的最大護法慈聖皇太后，似乎也曾願意襄助紫柏大師的刻經舉動，不過最終似乎沒有成行。那在後輩居士的記載裡成了——紫柏大師冀望更多人潤沐佛法，才拒絕了太后一人護持的本意。<sup>4</sup> 儘管如此，刊刻大藏依然從一開始，或多或少

<sup>3</sup> 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頁9。

<sup>4</sup> 于元凱，〈密藏禪師遺稿序〉載：「萬曆丙戌，師弟同入京師。慈聖皇太后知有刻藏之舉，欲發帑金命刻。尊者謂，宜令率土沾恩，師願以一身任事。」收入《密藏開禪師遺稿》卷首，收入《嘉興大藏經》續藏第二六六函，第6至第7冊。下引《密藏開禪師遺稿》皆出此版本。另參憨山年譜「三十一年癸卯」即紫柏卒年下福征疏云：「其刻藏緣起，在達師高足密藏公，奉慈聖太后旨，鳩工五臺。而究竟成就，則在徑山寂照化城，及吾郡楞嚴般若堂兩地。」（釋

受到上層的關注與影響，導致僧俗內對此一宗教大業關注頗多；紫柏、道開輩亦不得不因之四處結緣奔走。如此，則萬曆年間刊刻方冊大藏一事，所需遍歷之世俗因緣，必為千頭萬緒，或多有細節為學界前人關注而未發之覆者。<sup>5</sup>

後人總結，此次僧俗共同舉事的浩大工程，起初置於五臺山妙德庵，在經歷環境嚴冷、交通不利的四年考驗後，南遷至餘杭徑山，同時在嘉興楞嚴寺等地保有校經刊刻的場所。至於崇禎年間毛晉、錢謙益等推陳出新的《嘉興藏》刊刻行為，亦皆已多為研究者稔熟。但是這些關乎《嘉興藏》刊刻緣起、歷史、文本及參與人物的研究中，學界始終對一位堪為《嘉興藏》最重要的人物及其著作，關注不夠，那就是當時紫柏大師高弟——密藏道開禪師，及其存世的《密藏開禪師遺稿》。密藏道開，生卒年皆不詳，南昌人，曾為儒生，其生平傳記多附於紫柏大師傳記之後，如憨山德清所撰〈徑山達觀可禪師塔銘〉例。<sup>6</sup> 大藏經場遷出五臺山後，亦不知所蹤，為明清佛教史中一大懸案。以如此威望之高僧，交遊極為廣泛之人，忽而消失於傳世文獻之中，實在不容易找到合理的解釋。今存世《密藏開禪師遺稿》上下卷，收入《嘉興藏·續藏》，其中內容於入清之順治年間，才陸續收集刊刻而成。氏著遺稿之中的內容，時間多為萬曆十五年至二十年間，內容則涉及《嘉興藏》五臺山經場奔走運籌的書信，可見密藏道開為《嘉興藏》刻經早期最重要的管理者。有研究者稱此方冊大藏

---

德清自述，福徵注《憨山老人年譜自敘實錄》，收入《嘉興大藏經》續藏第二六六函，冊5，頁13。）

<sup>5</sup> 方廣錫，〈談《嘉興藏》的歷史地位〉，《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7，提到的刊刻歷史、入藏標準、現存印本等問題，依然是值得研究者繼續深挖的話題。

<sup>6</sup> 《紫柏老人集》卷首，《嘉興大藏經》續藏第二六三函，冊1，頁10。

為「密藏版」<sup>7</sup>，周叔迦先生將《嘉興藏》功勞歸於密藏道開，而幻予、紫柏、憨山為協助，亦頗有獨到眼光。<sup>8</sup> 對密藏禪師與氏著遺稿的全面及綜合之研究，殊非本文能夠涵蓋，本文僅就《密藏開禪師遺稿》一種之中，學界尚未關注過的細節，所簡要考訂，以證密藏禪師於晚明佛教史進程中之重要性，尚存不小的研究空間。

## 二、卜吉四山

《嘉興藏》刻印場地有前後之變遷，前期於五臺山妙德庵，四載而南遷餘杭徑山後，又屢遷諸寺址，前人多有論及。研究者以為當時擇五臺山原因，或為五臺地近京師，方便遊走公卿之故，此皆地緣之考慮，略觀紫柏、道開師徒長期遊走京師周邊，即能推知；然此說尚有不周之處，有待進一步考略。今欲察道開師徒最初所選五臺山的機緣與原因，或可推知開雕大藏的一些因緣際會。

查《密藏開禪師遺稿》上卷有〈與傅侍御〉長信一通（下稱「傅札一」），內容頗涉時事，多有可解讀之處。「傅侍御」即傅光宅，字伯俊，萬曆五年進士，為紫柏大師弟子信徒中少有的北人（傅系山東聊城人）。傅氏於萬曆十三年任河南道監察御史，

---

<sup>7</sup> 如紫柏緣起文中「自今而後，藏板不完，開心不死」。已有不少研究者對萬曆間徑山刻藏事做過了研究，如陳豪楚〈徑山寺刻藏述〉（《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大藏經研究彙編》）、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第十章〈關於《嘉興藏》的研究〉、前揭陳玉女《明代佛門內外僧俗交涉的場域》第四章〈五臺《嘉興藏》刊刻緣起及其社會資源〉、第五章〈江南《嘉興藏》刊刻各階段的社會資源與願求〉。另細簡《嘉興藏》本《密藏開禪師遺稿》全書，為大藏選刻場籌檀資皆出於道開奔走，刻藏大業實際操辦者即是道開，紫柏僅作精神偶像，下文詳論。

<sup>8</sup> 《法苑談叢》，《周叔迦佛學論著全集》冊3，頁1096。

遂有「侍御」之稱，其間巡按山西，<sup>9</sup> 則道開身在五臺山，諸事頗能求告傅氏，遂有此信。

先據信內容考其所寄時間。「傅札一」信尾聲有言：「不肖二月盡出足，過蘆芽，一訪妙師，復由燕都、牢盛，走江南，唱諸法侶，結集因緣，期秋冬歸山。流光幾何，敢復念緩？計此時門下科場事畢，或覆命，或請告，當亦聚首。」<sup>10</sup> 其中提到道開是年的行程，除會妙峰福登於蘆芽山外，即由北向南而行，化緣檀施。此時傅光宅為河南道監察御史，為京官中之顯要。筆者初至「計此時門下科場事畢」一語殊不能解，因查明代京官六年一輪之「京察」制度中，河南道御史是與吏部與都察院長官共同主持考察京官，<sup>11</sup> 則豁然明白，此「科場」為萬曆十五年那次「京察」之事。此信自然作於京察之後。「京察」例在當年二月。查十四年冬，道開似在京師；十五年元宵節，約眾居士聚於龍華寺。<sup>12</sup> 此後即如信中所言「二月盡」西行南下，所經最重要之處為山東大靈巖寺，下文詳論。此後至冬日歸五臺山，居「妙峰、憨山二師舊棲隱地」（信中語）之妙德庵或龍門，遂有此信。信中出現

---

<sup>9</sup> 于慎行，〈四川按察司提學副使傅公光宅墓誌銘〉，中言：「乙酉，召（傅）拜河南道監察御史，……按行二關，疏薦故薊帥戚繼光，眾論快之；廟堂意弗是也，有詔讓公。公方受命按晉，因請告歸。」參《穀城山館文集》卷 22，頁 643。另參馮夢禎《快雪堂日記》戊子（1588，萬曆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載：「得傅伯俊書。傅為山西巡按。」馮夢禎，《快雪堂日記》，頁 12。

<sup>10</sup> 前引《密藏開禪師遺稿》卷上，頁 47。

<sup>11</sup> 河南道功能可參《明史·職官志》卷 73：「都察院衙門分屬河南道，獨專諸內外考察。」並參徐美潔，〈明代京官考核〉：「何止非升即走，簡直血雨腥風」，澎湃新聞網，私家歷史。2017/5/26，[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23897](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23897)。

<sup>12</sup> 曾鳳儀，〈刻大藏願文〉：歲丁亥上元，密藏師約赴龍華道場，各發願言成就是事。《密藏開禪師遺稿》卷首。按，前引影印故宮藏嘉興藏《密藏開禪師遺稿》諸誓愿文皆未收，茲錄自台灣新文豐本《密藏開禪師遺稿》卷首，參《密藏開禪師遺稿》卷 1，CBETA, J23, no. B118, p. 4b5-6。

道開至「元旦」而卜吉四山，則道開此信所作時間，則在十五年丁亥之次年初，即十六年戊子（1588）。大略知其所作時間後，復觀此信中涉及一需拜託傅光宅之要事：

五臺因緣，向云云甚草率，不足據。昨歸山備采之，深幸本山都綱司，額有申文，撫按司道事例，省平地起風波，動世驚疑。又幸撫按司道，即批申告示，皆超情破格，尤便踵行，因擇其切要四事，私為屬草：先請命，繼且出以示該司，令其具申。儻其如所云云批發，則千載名山之幸，豈惟現前聖凡？大眾萬口頌恩，即曼殊老師，亦當於金色界中合掌。加額題請云云，非時世不敢望，第借以速有司奉行耳。立碑最為切要。即題請，亦一時故事，立碑則千年標幟也。其戒淫一節，初意欲重懲二三，以警什伯，已復念之，晴空霹靂，則其人必推原所自。今僧司既申劾，有司而批詞未復，未復則彼此當有鵠蚌相持之勢，此時乘而利之，乘此以清外障，乘彼以蕩內魔，兩無姑惜，兩有顯對，各心死無憾，此又在漁人運用之妙耳。<sup>13</sup>

道開口中「五臺因緣」，內容明顯不止五臺山經場，還有一系列計劃；但那些仍只是一個「甚草率」的草案，下文將詳論之。道開回到五臺作此信前，曾來到過五臺山佛教管理機構——設在大顯通寺內的僧綱司，詢問過關於建立經場的審批條件，其中尤以傅光宅御史或能襄助的切要「四事」，列於信中。茲「請命」、「加額」、「題請」、「立碑」等四事，僅此通文字，殊不易詳解，然此中有關於僧綱之「申文」的要求，則非常清楚，此一「申文」在道開給傅氏另兩封信中也有出現。

<sup>13</sup> 前引《密藏開禪師遺稿》卷上，頁47。

查道開遺稿中另有兩封連綴、寫給傅氏之書，並列於下。尺牘一（下稱「傅札二」）有云：

正月十五日，附書于中甫致門下，廿一日接中甫八行云：「十一日已出都門。」凡不肖與門下往來音問，皆屬曾司馬為之轉移；書至都城，想曾司馬當為致之矣。中甫使至，兼以門下兩尺牘見示，始知門下疏已及都門，甚為歡喜。大丈夫既不能展其所學，為斯世斯民，免饑溺、出水火，則笑談山水，揮斤煙霞，以遂其高，亦人生樂事；況垂老之親，所當奉歡菽水，窮劫之我，所當究竟頭面，而可不於此時決去就乎？第聞竟告休致，則恐又拂人情而來物議，此何時也？功名富貴，不啻若蛾燈蠶繭，寧喪其軀，無寧舍離，安有御史而告休致者？小年不及大年，亦無怪其然。疏草及□（按：原處墨釘）旨意，皆未得入目，不委云何；但據不肖妄意揣度，此時舉動，大都非陳情則稱疾，斯合世調之二者，而稱疾為尤順也，門下其裁之。<sup>14</sup>

此書中之「正月十五日附書」可注意。而下云傅光宅已於正月十一日出都城。原因是傅氏曾以御史身份上書神宗，最終落得「竟告休致」。道開也慨歎，只有閣部大臣會以「告休致」來威脅皇帝，哪有青年御史告老還鄉的呢！接下來一句「小年不及大年」亦可注意。道開彼時身在五臺山久，似乎不知傅光宅接下來得對應，所以才有為傅氏出了個「稱疾」的主意。那傅氏在彼時遭遇何事，查神宗實錄，萬曆十五年九月庚子條：

---

<sup>14</sup> 前引《密藏開禪師遺稿》卷下，頁47。

河南道御史傅光宅言：「將途當廣，將體當存，將權當重，將過當量。」又薦原任總兵戚繼光、左府僉書張臣、副總兵郭英。上以繼光曾經論劾下科看覆，奪光宅俸二月。<sup>15</sup>

于慎行為傅光宅身後所作〈明故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提學副使金沙傅公合葬墓誌銘〉載其生平時亦言：「疏薦故薊帥戚繼光，衆論快之，廟堂意弗是也。有詔讓公，公方受命按晉，因請告歸。」<sup>16</sup>傅光宅因為舉薦落寞之一代名將兼同鄉前輩戚繼光，而遭到神宗斥責；儘管他應該很清楚戚繼光與張居正的親密關係，是為神宗所最不能忍受。遭到斥責的傅氏決定辭官，是為晚明清流最為激進與幼稚之處。觀此處道開信中所述，則此信時間必在傅氏上疏之次年，萬曆十六年戊子，而前「小年不及大年」一語，最簡單的解釋便是十五年為京察之年，京官流動為世人所矚目所致。此信以下有云：

五臺因緣他盡可緩，獨申文一節，必得批行。立石斯為至要全美，即門下歸速，不及立石，而有按院批申，立案該道府州縣，亦足以為後日張本也。<sup>17</sup>

傅光宅去官，則五臺山少一得力護法，然道開念念不忘「申文一節」，則與上一通致傅光宅書同。

第二通致傅氏書（下稱「傅札三」）則又提此事：

---

<sup>15</sup> 《神宗顯皇帝實錄》卷 190，「萬曆十五年九月十四日」條。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明實錄》數據庫，2017/5/26，<http://hanchi.ihp.sinica.edu.tw/mqlc/hanjishilu?@4^762316280^809^^^0211001062741^@@2009199570>。

<sup>16</sup> 前引《穀城山館文集》卷 22，頁 643。

<sup>17</sup> 前引《密藏開禪師遺稿》卷下，頁 47。

即日曾司馬使者報言：不肖正月十五日寄門下書，業已託甘直指轉上，不肖甚危之。此書得從承差人附往即無慮；儻官封發舖，而門下又不投文，此必類收憲司，且將投之新院矣。書中所云五臺因緣甚絡索，兼有申草在內，脫投之新院奈何？不肖已趣使都城訊其事，圖止之，復顛人白之門下，乞留意查之。凡甘關院公文至，得盡收拆乃可；不然，則狼藉不少矣。大都中甫出都門，便有如許淆訛也。五臺事節，正月廿四日寄書雖復云及，即不詳矣；正月十五日書並重錄，申草呈上，幸委悉之。他餘皆在緩急間，獨申文一節，僧司業已候之門牆，萬一可行，乞批發，以了彼我一番心願，而名山有幸。萬萬不可，幸垂一語，微示去役，令其歸山。去役依不肖最久，頗伶俐，能領會也。從甘使者寄書儻已達彼岸，幸慰我報音。<sup>18</sup>

信中僧司「業已候之門牆」所涉之事，據尺牘仍殊難揣測，似乎為請內宮敕建寺院、賜額或頒賜大藏一類事，其中尤以得到「申文」為最重要，恐怕惟御史身份之傅光宅方能玉成，此事仍俟大明佛教制度專家。然查此三封道開予傅光宅之信，雖於遺稿中排列順序相去甚遠，但循其文意則為同一時段所作。「傳札三」中所稱兩封之前寄出而傅氏為收到之兩信，一為「正月十五日」所寄，一為「正月廿四日」所寄。以「傳札二」開頭介紹遞信由來及對申文的強調，「傳札二」當為「傳札三」中所謂之「正月廿四日」寄的那封。而「傳札二、三」共同提到那封「正月十五日」所寄之書，應當就是前引長信「傳札一」，則「傳札一」所作時間可精確至萬曆十六年正月十五。

觀尺牘「傳札一」中，最重要的信息，莫過於大藏刊刻經場

---

<sup>18</sup> 前引《密藏開禪師遺稿》卷下，頁50。

的選擇之上。「傅札一」中云：

刻經期場，向已十八九決策靈巖。昨歸清涼，有僧告以此地信名勝，第與黃巢故址比鄰，其遺風流俗猶有存者。迄今四山多豪客，竊發業於鹵劫，不以為怪，雖有司莫可奈何。不獨四山，即靈巖禿民，大多其種族；謂此山凡行人，欲入泥水、試堅利、化驍頑則可，藉欲舉緣事、集檀越，則不可。此僧曾居彼三年，且老成練達，其言有足信者。因作思：惟此期場非眇小，所有一切因緣，大小美惡，始終彼此；惟諸佛如來，悉知悉見，終非隔礙凡愚，所能測識趨避。

至元旦，遂以清涼、雙徑、牢盛、靈巖四名山，求卜於釋迦如來、文殊遍吉兩大士，及諸護法善神，以決狐疑。乃三舉三得清涼，今則有不得不遵如來敕命矣。清涼山水，渾厚盤旋，足下一入遊觀，當亦肯心自許。此去聊城，道僅倍靈巖，亦不甚遠。法門最近肉骨亦惟足下，足下當不以東西而異視之。

顯通寺為清涼首唱，其風水亦甲諸刹。唐觀國師造《華嚴疏鈔》即其地。其規模猶唐之舊，欲舉事，當就此。但「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此時山門甚凋謝，得門下垂一語囑都綱。住持云：「此山門怎麼陵替，何不請高僧為興隆？」之間或又問：「達觀老師父、密藏師曾到此否？」則此輩當自有來學之心矣。<sup>19</sup>

先觀所引第二段，自十四年丙戌春倡議以來，至十六年元旦之前的時間里，以紫柏、道開師徒為主的大藏經籌備工作的重心與成果、即刊刻大藏經的「期場」選擇，並非是五臺山，竟「十

---

<sup>19</sup> 前引《密藏開禪師遺稿》卷上，頁47。

八九決策靈巖」：基本上定在靈巖寺之中。此信中首選「靈巖」，非姑蘇之靈巖山，彼靈巖寺於明初重建後而毀，直到乙酉明祚之亡，才由名僧繼起弘儲重興。此處「靈巖」當為山東濟南城南五峰山中之大靈巖寺。傅光宅本人曾為大靈巖寺作〈重修千佛殿記並詞〉云：

先是，丁亥之春，有密藏上人結盟於林壑。戊子之夏，則達觀和尚說法於山岩。於時，典寶副陳奉者，方奉王命，督理寺工。受一言於密藏，投五體於達觀，奉戒精嚴，監工勤慎。遂爾山門炳煥，殿宇崔嵬。<sup>20</sup>

千佛殿為大靈巖寺最著名之建築，所供奉眾中古時羅漢彩色泥塑，享譽海內。細繹傅氏做記時間及內容，大靈巖寺此次「山門炳煥」的重建，首先當與內宮有關係。「典寶副陳奉」應當為當時司禮監掌印太監陳奉，所奉不僅有「王命」，應該還有宮中慈聖皇太后的懿旨，前來修葺寺院。同時，本地德藩也參與了此次重修活動。千佛殿梁間存有「時大明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九月八日德府重修」的題字，<sup>21</sup> 即與陳奉所來同時。今按，英宗子見潁封德莊王，就藩濟南府；其五世孫德定王翊館，於萬曆五年襲封，十六年薨，<sup>22</sup> 當即為此修殿之德藩。據傅文意，十五年秋重修此殿，當本為僧眾如道開、紫柏輩結盟說法之用，或亦即為大藏開雕之期場。查《紫柏別集·祭了然關主文》載：「萬曆戊子八月，余掛錫五峰山中。」<sup>23</sup> 又，道開〈示寂先師楞嚴寺住持了

<sup>20</sup> 馬大相，《靈巖志》，頁 64。

<sup>21</sup> 政協長清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長清文史資料》2，頁 68。

<sup>22</sup> 張廷玉，《明史·諸王世系表五》，頁 2903-2904。

<sup>23</sup> 《紫柏尊者別集》，《嘉興大藏經》續藏第二六六函，冊 1，頁 28。

然和尚行狀)有言「時(戊子年)達觀老師結夏靈巖」,<sup>24</sup>則十六年夏,紫柏即於此說法。

道開「刻經期場向已十八九決策靈巖」語,顯示大靈巖寺曾為刻經之準備,亦已不少;其未能如之願,信中做出了解釋。那是因為道開聽說山東民風彪悍、「豪客鹵劫」,而不容易匯集檀施、護持,此為一現實的考慮,今天看來亦頗有其合理性,「所有一切因緣,大小美惡,始終彼此」的說法,確可被視為一無奈之嘆。同時,山東藩王德定王於十六年早薨,似乎也對經場護持有所影響,然惜彼材料有限,不能斷言。

今觀清涼、雙徑、牢盛、靈巖四山選項。餘杭之徑山地處江南,本距紫柏、道開、幻予輩出家地近,眾江南檀越人脈密集;牢盛即憨山所住之東海牢山,以憨山之威望,亦為一大資源。濟南之靈巖,除新敕重建大寺,並有藩王護持。僅當時清涼五臺一山,似於萬曆十七年大藏開雕前,準備最不夠充沛的候選之地;至少較前三山之選,絕不在上風。道開所謂「求闡於釋迦如來、文殊遍吉兩大士及諸護法善神,以決狐疑,迺三舉三得清涼」;《遺集》中又與多人信中亦談及此「卜吉」之說,僅可作宗教徒至虔誠所致之遐想看;然其借助神靈附會之語,亦得見清涼之選,雖有可供支撐之有利資源,或不能盡言之於翰墨,惟道開、伯俊二人皆可解味也。

### 三、無邊捨宅

選定五臺山時間在萬曆十六年戊子元旦,但五臺方圓百里,哪座寺院作為經場亦未有著落。道開在信中透露的「顯通寺為清涼首唱」,則當時首先留意的經場候選是大顯通寺。今日所存五

<sup>24</sup> 《密藏開禪師遺稿》,冊8,頁59。

臺山顯通寺，為臺懷鎮最宏偉的寺院之一，明代五臺僧綱司所在地，高僧妙峰福登曾駐錫於此，所築金塔金殿今日猶存。然萬曆十五、六年間，大顯通寺「山門甚凋謝」，寺院尚頗為破敗。道開的想法是通過傅光宅與當地僧司溝通，圖復興寺院；至於顯通師徒，似乎也願意參與其間。不過「傅札一」里那句「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及轉述顯通寺住持的話語，悄悄透露了道開不屑的態度。從最終的結果看，顯通寺並沒有成為最終的經場，只是道開選擇初期的一個備選而已。

最終未能選擇大顯通寺作為經場的具體原因，因文獻所囿今不得而知；不過道開信中似乎表達出了對五臺諸當權大寺院的某種不滿，才最終被迫選擇了一處離臺懷鎮頗遠的院落。這種不滿可參前引正月十五之「傅札一」中：

聞慈壽主人為塔院住持有所請求。慈壽非高明，塔院最愚俗，或未免以一己之私，累足下之公，當察之，無輕聽。<sup>25</sup>

「慈壽主人」不出意外應當是京師大慈壽寺住持、僧錄司左善世本在。本在曾捐助過《嘉興藏》刊刻，且在《華嚴合論》一冊牌記中有其名字。<sup>26</sup>「塔院住持」則為五臺山大塔院寺住持，雖不易考察萬曆十五、六年間究竟為哪位，但似已非憨山德清、妙峰福登萬曆十年五臺山無遮會時的那位大塔院寺住持大方圓廣。<sup>27</sup>

<sup>25</sup> 前引《密藏開禪師遺稿》卷上，頁47。

<sup>26</sup> 章宏偉，〈明代萬曆年間江南民眾的佛教信仰——以萬曆十七年至二十年五臺山方冊藏施刻文為中心的考察〉，《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

<sup>27</sup> 大方圓廣事跡不詳，可參《憨山老人年譜自敘實錄》冊5，萬曆三年、十年諸條，頁27、42，及鎮澄所編《清涼山志》。「大寶塔院寺」條下「命比丘圓廣主其焚修」語。臺灣清華大學簡凱廷兄曾論大方圓廣與月川鎮澄之於大塔院寺之關係，於此殊有裨益，可以參看。

信中的那位京師最高僧官左善世，為塔院寺住持所請何事，似不可考，但似乎驚動了御史大人，道開頗有制止之意。可參正月廿四日「傳札二」一通中言：

聞愍師有書致門下，料必及五臺、蘆芽。師去山已久，恐有所籌慮，或未必時宜凡百，當以不肖所云為準，彼不足馮也。況妙、愍二師皆注念塔院寺，而不知此時塔院大非昔比，護之恐反損光明耳。<sup>28</sup>

此信中所言則更為直接，直斥塔院寺已今非昔比，不值得護持，其對塔院寺一方極為鄙薄則一目了然。此通信中還透露另一信息，愍山德清曾致書傅光宅，內容似乎與五臺及妙峰所在蘆芽山有關；而關乎五臺者，則必與開設刻經場有關。揣摩道開信中之意，似乎在擔心愍山勸傅氏護持塔院寺，而正中道開的難言之隱。信中「妙、愍二師皆注念塔院寺」一語，即是指二位高僧萬曆十年初，於此舉辦無遮大會，之後宮中誕下皇長子之事，五臺山、尤其大塔院寺成為一政教交織的神聖空間，而被當事人推崇。但道開以當時現狀出發極力阻止傅氏，「當以不肖所云為準，彼不足馮（憑）也」可以看出：此時以道開為主的刻經集團，與五臺本地塔院寺矛盾似不可調和。

雖與本地僧團矛盾不淺，但最終經場留在五臺山，其中一大因緣，是有一位高僧舍其僧舍成就經場所致。此事記載可參據萬曆十六年十二月十八馮夢禎《快雪堂日記》載：

---

<sup>28</sup> 前引《密藏開禪師遺稿》卷上，頁47。

日中，索肩輿，同仲淳至城山晤藏師兄，師兄言臺山無邊師舍道場事甚奇，世乃有此烈丈夫！<sup>29</sup>

是年冬，道開與江南居士馮夢禎輩會與武康石城山（今屬浙江湖州），道開親口與馮氏所言，五臺有位無邊大師，施捨其道場，用於刻經。同時之奉佛士大夫常熟瞿汝稷，曾作〈五臺山大博庵無邊和尚塔銘〉（《瞿罔卿集》卷十一），明末所修《補續高僧傳》卷二十二之〈無邊傳〉就是依據塔銘所作。查瞿氏所作塔銘載：

無邊，代州曹氏子……萬曆戊子，密藏、幻予二上人，以刻方冊大藏道場，卜之曼殊大士，三卜皆五鬢吉，因圖買山構室，以舉此勝因。師聞曰：「僧庵乃十方常住，而今之人悉私之，吾素以為恥。今幸際此勝因，吾盡將此庵及所有，施之藏公，使方冊大藏，早行閻浮提一日，是吾法輪一日轉也。」於是，悉召山中耆宿為證，一日而盡施，且立約云：徒屬以一盂一箸自私者，即擯出。藏公初尚猶豫未敢承，既見師意懇至，因聽焉。時師已有疾，又三月而化。其在病苦中，日夕與藏公徵決第一義諦，絕不以病苦少蹙額。<sup>30</sup>

又，《密藏開禪師遺稿》卷首〈幻余大師發願文〉載：

---

<sup>29</sup> 前引《快雪堂日記》，頁30。

<sup>30</sup> 瞿汝稷，《瞿罔卿集》卷11，收入《四庫存目叢書》冊187，頁268。

法本銜命歸清涼，開兄寓燕都盟諸居士各發願以襄盛舉。繼幸卜吉清涼，而無邊老宿且舍庵建期筮事矣。<sup>31</sup>

幻余法本亦為紫柏子弟；道開隱去後，幻余為徑山經場實際總裁。幻余發願文中記載，五臺之所以入圍的條件之一，確為無邊禪師提供期場。綜合瞿汝稷塔銘與馮夢禎日記所載，無邊和尚施捨時間在萬曆十六年中，但絕對在道開當年元旦卜吉四山之後；道開在是年正月間給傅光宅寫信時，尚不知曉此一大好消息。但若細究，無邊禪師所捨之僧舍究竟為何處房產，卻值得一論。

五臺經場最後定在妙德庵，研治晚明佛教者共知，但妙德庵一處並非無邊禪師所捨予道開者，道開似早就寓居於彼。而無邊禪師所捨之寺院，為瞿汝稷塔銘提到之「五臺山大博庵」。清補修《清涼山志》載其名作「大鉢庵」：

大鉢庵。紫霞谷。群峰拱抱，茂林森聳，無邊禪師得楚峰和尚道，濟下廿八代。<sup>32</sup> 楚峰常囑曰：「爾後有鉢飯，當共衲子食。」嘉靖甲子卓庵於此，掘得銅鉢，受鬥余，遂成叢林。<sup>33</sup>

大鉢庵，或大博庵，其位置與妙德庵之關係，因山志中無從交代，今亦殊難確定，亦或二者間有承接關係。二處皆在五臺山「紫霞谷」之中，即便為互相獨立之寺院，亦當去不遠，俟來日詳考。然可知萬曆十六年無邊坐化前所施道開之場所，非妙德庵之地，然妙德庵究竟何時真正作為刻經場所，則當俟新材料之發現。

<sup>31</sup> 前引《密藏開禪師遺稿》卷首。參 CBETA, J23, no. B118, p. 6a7-9。幻余文末署「萬曆己丑（十七年，1589）冬十月二十四日」。

<sup>32</sup> 前引瞿氏塔銘以乃師龍樹楚峰為臨濟下二十六代，存疑。

<sup>33</sup> 釋鎮澄撰、清初補編，《清涼山志》，頁 22。按，嘉靖甲子為公元 1564 年。

## 四、雙徑之圖

即便在萬曆十六年的信中致信檀越傅光宅、五臺山經場基本可定的同時，道開本人似乎却並沒有完全確認這一選擇；甚至一直以來，務實的道開禪師，對刻經場地的選擇，都有非常清醒的預案準備。在給傅光宅快信之前，萬曆十五年的春夏之間，他曾給南方的士大夫好友馮夢禎去信，談到過刻經場地的備選方案。馮開之，名夢禎，為道開至交，紫柏大師的俗家弟子。此時的馮夢禎剛剛因十五年那次京察時，被「以浮躁謫官」，<sup>34</sup> 居家杭州城內，並開始了漫長的日記生涯。當年六月二十一日記載：

廬山僧心悟，以曾于健、藏師兄書求見，為其師徹空禪師求塔銘。行狀，慙山筆也。留悟上人齋，送往昭慶文上人房。悟云：「聖母遣僧某，送法藏至天臺，秋初當至。」<sup>35</sup>

「曾于健」是曾乾亨，江西籍居士士大夫。那封廬山心悟和尚帶來的道開信札，正好保存在遺稿之中，署〈與真實居士〉一通。信中云「廬山徹空老師為江南大善知識，其徒心悟者，不遠萬里，奔逐為求塔銘」<sup>36</sup> 云云，就是此事。信中此前有云：

老師二月間往清涼，夏畢之峨嵋，不肖不遠亦且往清涼，俟老師行。時或隨其杖錫西游秦晉乃返，或竟歸燕都，或密走江南、江北，定刻經場所，此皆至清涼始決之。刻經因緣肯

---

<sup>34</sup> 語出錢謙益為馮夢禎所撰墓志銘，《牧齋初學集》頁1299。

<sup>35</sup> 前引《快雪堂日記》頁3。

<sup>36</sup> 前引《密藏開禪師遺稿》卷上，頁52。

苟就，無勞旦夕，即大舉就不難。第不肖意不欲居北，又兼此時緣，有所當諱避者，即失一時之近利，存法門之大體。<sup>37</sup>

萬曆十五年間道開之行程，可據前引致傅光宅信中，略可確定其南北行程，與其預計相去不遠；然此信中所言「皆至清涼始決之」，則言明道開將俟紫柏去冬與妙峰會面後，回到五臺上再決定。前引致傅光宅信中卜吉之說的時間在十六年正月，則十五年春紫柏、道開師徒尚未定下刻經場所。可能是冬天與妙峰的會面，加深了紫柏個人對在五臺山設場的意願，才授意道開，所以道開會在信中直言，自己是不願意把經場放在北方，但因為信中「有所當諱避者」，所以只能暫時擱置把經場放到南方來的安排。這個有所「避諱」的內容，遺稿及當時傳世文獻中幾無痕跡可尋，但以情勢推之，當與憨山、妙峰等建議重回五臺山建經場，以及僧錄司與塔院寺的脅迫分不開，甚至，內宮的旨意可能也參與其間，俟日後詳考。

至於道開跟馮夢禎說的，若是刻經工程「肯苟就」，不需太多時間就能完成大概，「即大舉就不難」。這裡的「苟就」顯然是按照他的思路，把經場置之南方，成功率會非常高。所以即便被迫要在五臺山的不利環境下繼續苦苦經營刻經場，道開依然同時積極安排南方徑山經場的籌劃，這點見得其眼光獨道；《密藏開禪師遺稿》另一封致馮夢禎之〈與馮開之居士〉一通載：

別來兩易寒暑，信光陰易度人命無常，不委足下邇者作何面目？夫三界種子，不越瞋愛二芽，然荊棘法身，戕滅慧命，則愛纏視瞋毒，其功能輕重大小，又不啻百倍。故古德於愛

---

<sup>37</sup> 前引《密藏開禪師遺稿》卷上，頁 52。

見，有以腦後箭喻之者，蓋覲面者易見，腦後者難知；易見者可回，難知者必犯也。青山白雲，足發幽想，聲色貨利，多滋俗情，不佞謂居士於城市山林，當分時而處若也。沈涵市井，久卻林泉，無乃不可乎？幻居兄飛錫南還，意在雙徑，雙徑去武林密邇，足下儻能以肩輿時相過從，則松風竹月之下，鑪香碗茗之間，可以滌煩襟而祛俗慮，澄性宇而湛心田也。矧楞嚴纂注，方待參評，惟足下圖之。刻經期場，南北終始，業已言之，仲淳雙徑之圖，似不可緩，足下與仲淳其密留意焉，務使彼輩歡欣樂，成事乃可久，且於化風無損也不盡。<sup>38</sup>

此處「別來兩易寒暑」，則為萬曆十四年丙戌，道開自嘉興楞嚴寺北上龍華、倡議大藏時算起，則此信當作於萬曆十六年。因前論十六年冬馮夢禎與道開會與吳興石城，則此信當又在稍前。道開信中所提之「幻居兄」名真界，即為紫柏另一弟子；次年正月，馮夢禎在杭州第一次見幻居禪師，數日后陪其一眾赴徑山。<sup>39</sup> 又，馮夢禎《快雪堂尺牘》有〈與張洪陽先生〉一通，是寫給日後的內閣大臣江西人張位的，信中說道：

密藏禪師長安問至，云旦莫南來，訂檢藏之期與處，而甚有意於餘杭之雙徑。此山為南方叢林上首，國一欽、大慧杲輩八十一人善知識住持處也。儻杖履及此，首為借重一臨，以為法道之助。<sup>40</sup>

---

<sup>38</sup> 前引《密藏開禪師遺稿》卷上，頁29。

<sup>39</sup> 可參馮氏《快雪堂日記》頁32。

<sup>40</sup> 馮夢禎，《快雪堂集》卷32，頁19。

馮夢禎此信寫作時間，據信開始有「去冬幸奉起居於江干」一語，參《快雪堂日記》萬曆十五年丁亥「十一月初三」條載：「謁張洪陽先生於浙江驛……同至六和塔晤蓮池師，洪陽先生約之出也」，<sup>41</sup> 則此信作為次年十六年；而其中又提到的道開自北京所來信云云，則馮氏此信當在十六年初。信中所云道開「甚有意於餘杭之雙徑」，而欲南下圖餘杭徑山經場，則與前信中安排幻居和尚南下，實為一緣。信中歷數唐代宗接見過的國一道欽法師、宋高僧大慧宗杲故事，證明徑山佛法廣有淵源，正合張閣老大護法的身份。另，瞿汝稷有代擬〈勸請幻予密藏二上人住徑山書〉兩篇<sup>42</sup>，分別是代內璫與諸山的，全文用四六駢體，殊不易查其寫作時日。但既有勸請駐錫書，則二位禪師尤其是道開曾對徑山傾心，應該是當時居士們所認同的。

復觀此〈與馮開之居士〉信可知，紫柏、道開等曾有意讓其開拓徑山經場。信中要求馮夢禎配合幻居禪師「務使彼輩歡欣樂，成事乃可久」一語，則針對徑山僧眾而言，可參道開另一通〈與繆仲淳居士〉所載：

但得親齋就土，孺東已吊，孰若暫作清涼遊，以遠塵樊？沉青山白雲，足生幽想，高人逸士，可滌煩襟。儻遂斯行，誠計之得。又且清涼一遊，竊恐足下終未可免，時節因緣，亦在今日，過此似難舉策矣，惟足下圖之。刻經期場，南北終始，業已獨為足下言之。雙徑之圖，於今似未可緩。茲幻居兄南還，當送其掛錫彼所，潛為啟發，然後足下與開之先生，

<sup>41</sup> 前引《快雪堂日記》頁8。

<sup>42</sup> 《瞿叕卿集》頁286-287。其中第一篇宋奎先輯《徑山志》署馮夢禎作，參魏紅豔，浙江大學博士論文〈馮夢禎研究〉，頁202。

因之往反，以便宜取事。俾彼輩無所猜忌，傾心樂成，斯為得也。惟足下與開之先生，密留意焉。<sup>43</sup>

「繆仲淳」為繆希雍，字仲淳，萬斯同《明史稿》有傳，晚明著名醫家，同時是《嘉興藏》重要護法。信中「親齋就土」與「孺東已吊」，是當時兩件喪事，江南居士圈頗為擾動。其一為繆希雍母親之喪，繆母隕於萬曆十四年初夏、道開於龍華寺首倡開藏稍後，<sup>44</sup>但繆孝子多年以來一直沒有找到理想的葬母之地，馮夢禎等老友長期陪其尋訪風水寶地。其次是「孺東已吊」中的徐貞明字孺東，《明史》有傳，徐卒於十七年夏，快雪堂日記及尺牘皆有記載，可以參證。<sup>45</sup>徐亦是藏經護法，道開好友，道開至繆氏信中遂會言及。則此信當在十七年夏之後。然此信中對徑山經場之安排更為直白，幻居此來，目的是「潛為啟發」，再由馮、繆二人「因之往反」，要讓徑山寺僧對刻藏「無所猜忌，傾心樂成」，則可見道開彼時心中刻藏安排的複雜狀況。

道開另有〈與馮開之居士〉一通言：

刻藏因緣雖已就緒，然期場南北，未卜終始。此方撰述，校讎端屬名賢，幸無忘。念新刻《楚石語錄》諸典各一部，遠

---

<sup>43</sup> 前引《密藏開禪師遺稿》卷上，頁33。

<sup>44</sup> 馮夢禎曾作繆母周孺人墓誌銘，再繆仲淳母逝於萬曆十四年四月十八日。馮夢禎《快雪堂集》收入《四庫存目叢書》冊164，頁252。

<sup>45</sup> 《明史·徐貞明傳》作其卒於十八年庚寅，誤。參《快雪堂尺牘·與繆仲淳》：「徐孺東使者以七月初一日，投二牘於徐村，一與弟一與足下。使者皇遽而去。又四日，徐村僧以牘見付，啟視則孺東兩郎名刺，稱孤哀子，其為孺東凶問無疑，不覺震悼。」參前引《快雪堂集》頁488。

充法供。幻居兄掛錫徑山否？護持之責舍足下其誰，並乞留意。<sup>46</sup>

因敘及刻藏與幻居二事，則時間當在十六、十七年間。此三封信中共同的一個話題就是向馮、繆二位大護法介紹「刻經期場，南北終始」的決定，但最詳細的那兩封「業已言之」、說明詳細機緣的信，我們今天在遺稿中似看不到了。但即便如此，從餘下這幾封尺牘中，依然能看出道開對刻經場地「未卜終始」的窘境。而彼時至晚已十七年夏，五臺山經場已經開始運作，道開竟能預知其時日不永，定有其難言之隱，而致使其南遷後，不得不歸隱，是為學界長期忽視者。惜道開遺稿遠非全璧，殊難推測其大概，俟他日新材料發現。

## 五、尾聲

梳解讀前人尺牘、日記諸種文獻，歷來被視為廁於豆丁考證之流，因基於文獻的宗教史考證，往往要經歷反覆排比與徵引尺牘日記、甚至是更為細屑史料的過程之後，方能得到一個小而局部的修正結論，筆者亦深知本文區區萬字只能解決一個極小的問題。況且本領域（即明清佛教歷史、文獻）缺少一定量的研究儲備與基礎，對任何一條既有認識的修正需要花上比早先建立此說多得多的材料與陳述。同時，因針對明清時期《嘉興藏》的研究囊括了歷史學、文獻學、文學人物等多學科領域，早年間對相關內容的研究囿於各部文獻間複雜的關係解讀的限制，或多或少都存在偏差或舛誤。直到近年，包括祕藏《嘉興藏》及大量明清別集的相繼影印出版，才使後進學人有了發前人所未發之覆的機

---

<sup>46</sup> 前引《密藏開禪師遺稿》卷下，頁19。

會。但海量材料與數據的出現，也帶來了對象的複雜化，圍繞《嘉興藏》而展開的話題，逐漸分化成「經藏目錄」、「刊刻地」、「檀施」甚至是「牌記」等次一級內容。

就本文而言，筆者主要筆墨關注於五臺山方冊藏刊刻場所選擇，而實際所欲揭示的是《嘉興藏》的緣起中，宗教因緣以外的政治、世俗、經濟等多重合力在刻經事業中的共同作用，使得即便一場地的選擇也會讓主辦者道開禪師費勁心力。因初創時經場的選擇存在無奈與妥協，所以導致了整個經場在之後運作中繼發的各種齟齬牴牾，最終讓以紫柏、道開為首的刻經團體放棄五臺山經場，南下徑山。而正是此次南北易地，導致了紫柏大師再也無心方冊藏刊刻，道開禪師更是毅然隱去幾乎消失在日後所有的文獻記載之中。方冊藏前期的刊刻事業高潮在開始不過四載的時間裡蕭然褪去，晚明以來僧俗互動的場域似乎也來到一個低谷。某種程度上，萬曆二十年經場南遷後以及之後京師佛教活動低潮期的開端，就是本文所討論的經場草創時的猶疑與掣肘。而這只揮動翅膀的蝴蝶，對此後朝野信仰生活的劇烈影響，卻是歷來明代佛教與《嘉興藏》刊刻研究所缺失的。構建這一僧俗交互的敘述體系，正需要運用更為廣泛的史料並細小到尺牘日記等等，從被前人忽視的細節入手，尤其嘗試挑戰或糾正之前研究中普遍根據僧人自述等單一史料所建立的佛教史話語權。因此，本領域對於佛教史及一人一事的考訂，儘管有時會過於繁瑣，仍是有其必要性與現實的考量。

## 引用文獻

### 佛教藏經或原典文獻

- 《嘉興大藏經》。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 《紫柏老人集》。《嘉興大藏經》續藏第二六三函，冊 1-6。
- 《紫柏尊者別集》。《嘉興大藏經》第二六六函，冊 1。
- 《憨山老人年譜自敘實錄》。《嘉興大藏經》續藏第二六六函，冊 5。
- 《刻大藏願文》。《嘉興大藏經》續藏第二六六函，冊 6-7。
- 《密藏禪師遺稿序》。《嘉興大藏經》續藏第二六六函，冊 6-7。

### 古籍

- 〈送大圓禪師住持潭柘龍泉寺序〉。《虞德園先生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水滸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年。
- 《快雪堂日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
- 《快雪堂集》。《四庫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3年。
- 《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長清文史資料》第2輯。山東：政協長清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1985年。
- 《帝京景物略》。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
- 《清涼山志》。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
- 《穀城山館文集》。《四庫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3年。
- 《瞿罔卿集》。《四庫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3年。
- 《靈巖志》。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1994年。

### 中日文專書、論文或網路資源等

- 方廣錫（2016）。〈談《嘉興藏》的歷史地位〉。《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7。頁 76-80。

- 李富華、何梅（2003）。〈關於〈《嘉興藏》〉的研究〉。《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頁 645-508。
- 周叔迦（2006）。《法苑談叢》。《周叔迦佛學論著全集》。北京：中華書局。
- 章宏偉（2016）。〈明代萬曆年間江南民眾的佛教信仰——以萬曆十七年至二十年五臺山方冊藏施刻文為中心的考察〉。《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頁 111-126。
- 陳玉女（2010）。〈五臺《嘉興藏》刊刻緣起及其社會資源〉。《明代佛門內外僧俗交涉的場域》。臺北：稻鄉出版社。頁 141-185。
- 陳豪楚（2005）。〈徑山寺刻藏述〉。《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大藏經研究彙編下》。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頁 181-188。
- 魏紅豔（2014）。〈馮夢禎研究〉。浙江：浙江大學博士論文。頁 220。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神宗顯皇帝實錄》。《明實錄》數據庫。2017/5/26，<http://hanchi.ihp.sinica.edu.tw/mqlc/hanjishilu?@4^762316280^809^^^0211001062741^@@2009199570>。

# From Mount Wutai to Mount Jingshan: Mizang Daokai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Early Printing Sites of *the Jiaxing Canon*

Qi-yuan Wang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Chinese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Institute, Fudan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printing publication of the *Book-format Canon (Fangce Zang)*, later known as *the Jiaxing Canon*, was presided over by the monk, Mizang Daokai. The publication process has met with various difficulties in finding a proper monastery to operate the task. It is recorded that the Miaode Temple on the Mount Wutai was known for the early monastery to publish this Canon, however, a more complet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real situation was more complicated. Miaode Temple was not the earliest candidate, rather, the final decision was made after a long period of communication and debate by the leading monastics and the donors. The Posthumous Manuscript of Chan Master Mizang Daokai includes letters written by Mizang Daokai, which preserve indispensable records regard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event of the printing of *the Jiaxing Canon*.

This document has been overlooked by scholars; hence, this article aims to study it and collates other documents recorded by the literati contemporary to Mizang. The task of this article is to reconstruct the history between Year 14 to 16 of the Wanli Era that reveal the complex networking involved in the publication of *the Jiaxing Canon*, and to show the genuine efforts made by the monastics for spreading Buddha Dharma.

## Keywords:

Mizang Daokai; the Jiaxing Canon; Mount Wutai; Printing Sites; Fu Guang-zhai; Feng Meng-zhen

